蒙古与大理关系新探
——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石 坚 军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形成了假道大理经南宋广西北上灭宋的“斡腹之谋”。前四汗时期,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即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古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要道,大理及周边诸蛮被迫卷入蒙古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因而其时蒙古与大理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关键词:蒙古;南宋;大理;斡腹之谋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0)04-0101-05

学界普遍认为忽必烈 1252年远征大理之举乃为实施假道灭宋的“斡腹之谋”,但目前尚无人对“斡腹之谋”做过专门研究。笔者已对“斡腹”词义、渊源以及蒙古军“斡腹之谋”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初步研究[1],本文拟以“斡腹之谋”为视角,对蒙古前四汗时期蒙古与大理关系做一新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斡腹之谋”:成吉思汗远征大理军事计划

史载金将郭宝玉 1211年降附蒙古军后当年或次年觐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2](3521)。前人多以为“西南诸蕃”指大理诸蛮,但仔细分析引文,可知“中原”必指金朝,金朝西南之“西南诸蕃”当即西夏境内诸部族,而并非大理诸蛮,或黄河河曲以南川、甘、青毗连地区,即藏彝走廊北端诸蕃部族[3]。先取“西南诸蕃”“藉以图金”实乃“假道西夏”[2](3526)联夏攻金战略,1216年三合拔都借路西夏直捣开封西郊 20里杏花营之役即体现了此战略思想。史载 1211~1213年期间,“帝(成吉思汗)将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险,问(郭)宝玉攻取之策,对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2](3521)。《元史》中“西蕃”、“西番”、“吐蕃”、“土番”、“土波”均泛指吐蕃诸部,可知至迟 1213年成吉思汗又有远征西夏西南吐蕃诸部计划,此亦可为上文“西南诸蕃”指西夏诸部族之旁证。又据波斯史籍,可知成吉思汗至迟在攻降吐蕃某部、西夏后的 1218年已有远征哈剌章(即大理)的战略计划,但此计划因屈出律之乱暂时被迫中止[4](83~84)。成吉思汗其时远征大理的战略企图不免令今人匪夷所思,或令读者怀疑上述史料的真实性。但下面一段汉文史料足证

收稿日期:2009-11-20
基金项目:内蒙古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项目“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NJ709027)
作者简介:石坚军(1979-),男,山东栖霞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蒙元史研究。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成吉思汗远征大理军事计划绝非空穴来风，从而可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 臣自就列以来，便阅广西经略司据岑邈、谢济所申，以为敌（蒙古军）已破大、小云南。云南与广西为邻，审如所申，广西事体直可寒心。今庙算深长，必能选有威风大臣控扼广西，如招兵积粟等事，或通湖南，或通广东，想皆次第施行，算无遗策矣。而臣之愚见，则以为上流尤所当备。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当时说者皆以为迂。[5](卷339《论湖北蜀西具备疏》)

前人据此疏所言“臣自就列以来”、“臣连疏求去，蒙陛下宣谕，强颜复留”，吴昌裔1235年底任监察御史、1236年七月改任太常卿兼史事、1240年卒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及1236年十二月初一“视朝转对”[5](卷339《论本朝仁政及边事奏》)所上《论本朝仁政及边事奏》诸事，推断此疏当上于吴昌裔在京朝班“就列”之时的1236年十二月初一后、1237年上半年离京赴蜀前[6]。此说甚是，但笔者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已进一步推断上疏上于1236年十二月初一后的当月[7]。据吴昌裔所言“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之事，可知其“十年前”的1227年已风闻“斡腹之谋”。蜀人吴昌裔1227年在四川为官[8](12301)，而蒙古军当年春首次攻掠南宋四川境内，并于当年夏主动退兵，因而其在蒙古军首次攻蜀的1227年始风闻“斡腹之谋”颇合情理。1227年“丁亥之变”可谓宋蒙两军首次正式交锋，其时宋人对蒙古军首次攻蜀战略企图理解不一。或以为乃“取金夏”[9](卷25《丁亥纪蜀百韵》)，或以为“不过如汉时匈奴以胡骑兵驰禾稼，五代时契丹纵番兵入打草谷”[10](卷37《西陲八议》)，而吴昌裔当时可能据所闻蒙古军“借路云南，图我南鄙”的“斡腹之谋”以为蒙古军并非漫无目的四处抄掠，而系探路问道而来，以致“当时说者皆以为迂”。

既然在成吉思汗遣军首次攻蜀的1227年当年吴昌裔已风闻“斡腹之谋”，则“斡腹之谋”当出台于1227年前，蒙古军假道大理经广西“斡腹”攻宋战略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笔者已考蒙古军灭金战略在酝酿与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假道对象由西夏东境转移至西夏西境、南宋汉中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假道大理攻宋的“斡腹之谋”[1]。“斡腹之谋”源于蒙古军“斡腹”攻金战略，其实施重要前提为平夏灭金，进而相继平定吐蕃、大理以征服南宋。宋人李鸣复“彼（蒙古军）其奸谋诡计，未必不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蹙金，则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窥我（南宋）”[5](卷338《乞严为广西之备疏》)之言，可谓一语道破了蒙古军在宋蒙正式开战前已预知南宋长江防线与此前金朝（潼）关（黄）河防线一样难以遽破，而欲以“斡腹之谋”绕至长江之尾假道吐蕃、大理迂回攻宋。

“斡腹之谋”主要与进军路线密切相关，此战略的出台要求蒙古军对攻宋所假道对象——西夏、吐蕃、大理及周边诸蛮地理形势有初步了解，蒙古军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或间接认识可能来自外族人士之口或一幅较完整的舆图。1234年南宋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真德秀曾上奏宋廷言当年出使南宋的蒙古使者王檝所云“鞑相移剌楚材（即耶律楚才）曾上平南（宋朝）之策，与王檝议不合”一语当“似实语”[11](卷16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1215年投奔成吉思汗的耶律楚才“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而“帝每征讨，必命楚才卜”[2](3456～3457)，以耶律楚才之才干及在蒙古汗廷之地位，其很有可能为“斡腹之谋”献策者，而并非学界传统以为的郭宝玉。

二、“斡腹之谋”流传与实施概况

学界对忽必烈平大理后“斡腹之事”已有较多研究，而对宋蒙正式开战后至忽必烈平大理前“斡腹之谋”在南宋流传及实施概况鲜有论述，下面按时间顺序重点探讨一下后一问题。

“斡腹之谋”虽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而宋人吴昌裔1227年已风闻“斡腹之谋”，因其时宋蒙尚未正式开战，且蒙古军长期忙于攻金，故此后多年南宋再无“斡腹之传”。1235年秋蒙古军正式伐宋前不久，宋军已谍知蒙古军“聚兵牧马，决意南来，一渡河、洛以窥江、淮，一由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以窥襄、汉，一托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以窥四川，三道并入”[5](卷339《论三边备御状》)，且蒙古军第一勇将速不台“将自木波界窥我西蜀”[12](卷6《是日上不视事缴进前奏事札子》)。木波四族长结什角“其地北接洮州（今甘肃临潭）、积石军（今青海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循化)”,“东南与叠州(今甘肃迭部)羌接”,“疆境共八千里”[13](2017),而与十八族地界相连。1232年宋人彭大雅出使蒙古后不久曾言木波为蒙古“残虐诸国”中“已争而未竟者”[14](26)。1235年春蒙古汗廷在遣曲出、胡土虎伐宋的同时,曾命阔端远征秦、巩汪世显部[2](34)。因此,可推知1235年蒙古军伐宋前已决定彻底平定秦、巩、木波进而经十八族地界迂回包抄蜀西,即假道木波、十八族地界“斡腹”攻蜀。正所谓“鞑之谋蜀也,先破秦、巩,次降诸蕃”[15](卷31《知安吉州蒋左史重珍》),因而吴昌裔1236年上半年曾言“臣近闻鞑虏破阶(今甘肃武都)窥文(今甘肃文县),欲为斡腹深入之计,又攻打蕃族,径为间道取蜀之谋”[5](卷100《催王遂入蜀状》),当年七月又言“秦、巩、松(今四川松潘)、维(即威州,今四川理县薛城镇)之族,诱之(蒙古军)以斡腹,内外受敌,殊可寒心”[5](卷310《论四阴之症状》)。此为宋蒙正式开战后蒙古军欲自蜀西诸蕃地界“斡腹入蜀”之报,而与1236年冬吴昌裔所言蒙古军欲自大理“斡腹攻广”之报截然不同。

广义而言,宋人所谓“斡腹之谋”有双重含义:一为自秦、巩假道吐蕃木波、十八族或大理“斡腹入蜀”;一为自大理或安南(今越南北部)“斡腹攻广”。前者服务于后者,而为蒙古军实施“斡腹之谋”初期阶段军事行动。宋蒙正式开战后的1235年或次年,四川、广西及周边诸蛮多向宋廷申报蒙古军已破大理之事[5](卷339《论湖北蜀西具备疏》),说明“斡腹之谋”已流传至这些地区,并对诸蛮造成极大震动和恐慌。至迟在嘉熙二年(1238年)或次年,南宋广东时人亦风闻“鞑窥大理之说”[16](卷22《与广西蔡帅范书》)。1239年,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上奏宋廷“谓鞑贼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5](卷338《乞严为广西之备疏》),可知蒙古军“斡腹之谋”在“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基础上又进一步计划“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以“斡腹”攻宋。1240年正月,“或谓虏(蒙古军)攻南诏”[16](卷22《与杜尚书杲书》),当年秋宋人又谍知“南诏复有(蒙古军欲)假道之传”[17](卷10《八月已见札子》),可知蒙古军欲借路大理攻宋的“假道斡腹之计”[9](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在嘉熙年间愈传愈广,以至昔日号称僻陋之地的福建、广西亦开始被宋人视为腹心之地。1240年“大理国请道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人贡”[11](卷143《孟少保神道碑》)南宋之事,必与大理国人已风闻“斡腹之谋”而预计蒙古军即将假道蜀西进攻其国的复杂军事形势有关。1241年初,“或言虏谋自安南斡腹”[11](卷141《杜尚书神道碑》),“牒报鞑谋由交趾趋邕(今广西南宁)、宜(今广西宜州),……自辛丑(1241年)而后,斡腹之备虑若缓若急,将信将疑,岁岁如此”[11](卷108《跋赵倅与灏条具斡腹事宜状》)。可见蒙古军至迟1241年初又有假道安南攻宋战略计划。“斡腹之谋”由“借路云南,图我南鄙”、“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发展为“自安南斡腹”、“由交趾趋邕、宜”,此大致为其在南宋流传过程中的演变轨迹。

1245年春,宋人首次风闻蒙古军开始远征大理之事[16](卷22《与广西蔡帅范书》),广西地方官员则于招马官、自杞获知蒙古军进攻大理及大理告急求援之事[9](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当年宋廷命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孟珙调兵三千增戍广西[16](卷19《与懂侍郎槐书》)、次年命广西经略安抚使董槐遣人出使大理之举[9](卷17《帅广条陈五事奏》),以及宋人1246年所闻蒙古军明确“声言袭我(南宋)广右”[18](卷1《丙午轮对第一札结人心》)诸事,促使“斡腹之谋”在1246年基本为南宋朝野共知,甚至当年有“闻诸上流阃幙,以为大理久已降敌(蒙古军)”[19](卷1《轮对奏札》)的谣传。而此前宋廷以“广中斡腹之传”“事关机密,恐播传于外”[20](卷7《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阙奏札》)严防外传,致使“斡腹之谋”仅为南宋部分上层所知。笔者检诸史籍,发现1246年是忽必烈平大理前宋人“斡腹之传”最频、“斡腹之忧”最深、“斡腹之议”最多、“斡腹之防”最严的一年。当年除刘克庄曾言“臣每怪鞑在草地,哨骑在淮北,斡腹之谋在安南”[11](卷52《召对札子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对“斡腹之谋”仍将信将疑之外,其他宋人均将“斡腹之忧”或“斡腹之虑”集中在蒙古军将自大理进攻广西上。

淳祐后期,尤其是1249年贵由汗驾崩后,因汗位之争,蒙古军“斡腹之谋”实施进程放缓,南宋“斡腹之传”逐年减少乃至消失,遂对“斡腹之谋”疏于防范,以致对蒙古军1253年平定大理之役一无所知。1254年七月,宋廷尚误以为大理可自行抵御蒙古军,荆阃、蜀阃亦均上奏宋廷大理尚可抵抗蒙古军;而广西虽有蒙古军欲自广西“斡腹入寇”之传,但尚未得虚实。1255年二月,左丞相谢方叔始上奏宋廷“广西之传”不虚,蒙古军果真有“斡腹之谋”[21](2314、2318)。1257年秋,宋人又获知蒙古军进攻安南而欲假道安南攻宋的“安南之报”,至此,宋廷始最终正式确认蒙古军果真有假道大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理、安南经广西北上攻宋的“斡腹之谋”。而事实上蒙古军假道大理、安南攻宋的军事计划已酝酿几十年，且兀良合台自大理假道安南攻宋为蒙哥汗1256年灭宋战略计划的重中之重[22]，因而史籍多误载1259年兀良合台自大理假道安南或交趾攻宋[2](61、3003)、[23](卷31《湖南安抚使李公祠堂记》)。

与蒙古军实施“斡腹之谋”直接相关军事行动，主要有1227年攻掠四川之役、1235～1236年自秦巩、木波、十八族攻蜀及“自西和(今甘肃西和西南)径入石泉(今四川北川县西北治城羌族乡)、威、茂(今四川茂县)以取蜀”[24](卷32《东师议》)之役、1238年冬“直抵雕门(即碉门，今四川天全县关镇西)、黎、雅、木波国界”[25](卷24《梁秉钧碑》)“透漏黎州以后之大渡河”[5](卷338《乞严为广西之备疏》)之役、1239年多达那波率军进至今拉萨北部热振寺(位于今西藏林周县境内)及附近杰拉康寺一带之役、1244年在多达那波进藏路线基础上兵锋直指大理九和镇(今云南玉龙县九河乡)之役[26]、1247年进攻黎州西南大渡河之外青羌之役、1248年宋蒙岩州(今四川泸定岚安)马鞍山之役、1251年吐蕃境内蒙古军、汉军仍前征进之役[2](45)、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之役、1255年兀良合台自大理经乌蒙、秃剌蛮北上攻蜀之役、1256年蒙古军自大理进攻叙州(今四川宜宾)、吕告蛮与乌琐(即乌撒)之役、1257年自大理分兵攻降罗鬼与安南之役、1258年兀良合台自大理经特磨道、自杞进攻广西之役、1259年兀良合台自大理经自杞、罗殿攻入广西以北上攻宋之役。其中，忽必烈平大理之役可谓实施“斡腹之谋”关键一环。从以上诸役用兵方向、假道对象、进攻目标来看，可知随宋蒙战况变化，蒙古军“斡腹之谋”在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假道对象由东西移、迂回包抄范围愈来愈广的过程，蒙古军对宋战线由吐蕃东徼木波、十八族、威茂二州之外的外夷、青羌一线向西南移动，而经吐蕃腹地、大理、安南转至蜀南、广西周边地区。

三、结语

“斡腹之谋”形成于蒙古军尚未灭金、宋蒙并未正式开战的成吉思汗时期，说明蒙古军灭宋之志蓄谋已久，而宋蒙开战并非偶然。“斡腹之谋”主要内涵为避开南宋坚固长江防线而假道大理迂回包抄南宋薄弱后方，避实击虚、舍坚攻遐以灭宋，显示出蒙古军不仅沙场上骁勇善战，战略上亦足智多谋。蒙古军计划自蒙古高原不远万里史无前例地穿越难以通行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去长途奔袭南宋后方，此为典型蒙古用兵习俗，即“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矧，猎取之若禽兽然，聚集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24](卷32《东师议》)。“斡腹之谋”可谓贯穿于前四汗时期宋蒙战史的主线，期间蒙古军逐步将其付诸实施。1259年，蒙哥汗为彻底实施已酝酿数十年的“斡腹之谋”而命兀良合台自大理经广西北上攻宋，但此次假道灭宋之役因忽必烈撤兵北归自立为汗而以彻底失败告终。忽必烈即位后放弃了前四汗时期自大理、安南迂回攻宋的蒙族“斡腹”战略，而改用自荆襄正面攻宋的汉家“捣背”战略，“斡腹之谋”宣告终结。1260年至1279年宋亡期间，“斡腹之传”在南宋销声匿迹。

通过上文对“斡腹之谋”来龙去脉的考述，可从“斡腹之谋”这一独特视角，从战略高度对前四汗时期宋蒙战史、蒙古与大理及周边诸蛮关系进行新的探讨。“斡腹之谋”反映了蒙古汗国上层欲统一昔日汉唐故土以结束天下四分五裂局面的政治愿望与雄心壮志，不愧为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所制定的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最伟大战略。1259年蒙哥汗灭宋战略计划虽以失败告终，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前四汗时期“斡腹之谋”的伟大高明之处与重大历史意义。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古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大理及周边诸蛮相继卷入蒙古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蒙古军为实施“斡腹之谋”而亡西夏、灭金、收吐蕃、定大理、臣安南、破乌蒙、降罗鬼、划自杞、平罗殿，所开疆扩土几近蒙古帝国东方版图一半，从而从战略的高度有力促成了13世纪“鞑靼世纪”或“蒙古世纪”的形成。其时蒙古军对吐蕃、大理及周边诸蛮之经略主要服务于开辟一条路经吐蕃、大理或安南而至南宋广西的用兵路线，而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

参考文献：

[1] 石坚军. “斡腹”考述 [J]. 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5).
[2] (明)宋濂. 元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曾现江. 先取西南诸蕃，后图天下——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 [J]. 西藏研究，2005(4).
[4] [波斯]拉施特.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M]. 余大钧，周建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 (明)黄淮，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 郭正忠. 耻堂奏札与蒙攻云南——兼涉晚宋一项岁收年代的考辨 [J]. 中国史研究，2000(1).
[7] 石坚军. 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 [D].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8] (元)脱脱. 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宋)李曾伯. 可斋杂稿 [M]. 宋集珍本丛刊本.
[10] (宋)吴泳. 鹤林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宋)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 [M]. 四部丛刊初编本.
[12] (宋)袁甫. 蒙斋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元)脱脱. 金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 王国维. 黑鞑事略笺证 [A]. 王国维遗书：第 13册 [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15] (宋)魏了翁.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M]. 四部丛刊初编本.
[16] (宋)方大琮. 铁庵集 [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17] (宋)杜范. 清献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宋)孙梦观. 雪窗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宋)高斯德. 耻堂存稿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宋)李昴英. 文溪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元)佚名. 宋史全文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22] 石坚军. 蒙哥汗灭宋战略计划新探 [J]. 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4).
[23] (元)苏天爵. 元文类 [M]. 四部丛刊初编本.
[24] (元)郝经. 陵川集 [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25] (清)胡聘之. 山右石刻丛编 [M]. 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26] 石坚军. 忽必烈征大理路线新考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1).

【责任编辑　谢海涛】

A New Study on Mongolia-Dali Relation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fu stratagem”

SHI Jian-j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Chinggis Khan, the Mongolian army formed the “wofu stratagem” that by way of Dali Kingdom to conquer South Song Dynast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ng-Mongolia relations and war situation, the Tibetan—Yi corridor along Tibet and Dali became main attack direction Strategically or march route of the Mongolian army. Tibet tribes, Dali and peripheral various nationality were forc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Mongolian army’s conquest plan and action. The Mongolian army’ management of Dali and peripheral various nationality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four Khans mainly serves for opening up a march route passing through Tibet and Dali to the South Song Dynasty Guangxi, thus Mongolia-Dali relations in this period have bright military color.

Key words: Mongolia; Dali Kingdom; South Song Dynasty; wofu stratagem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